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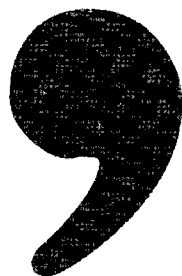
国学典藏 / 叶匡政 主编

华语世界权威国学读本
台湾国学教师必读手册

大学中庸高级读解

李璫◎等著
海峡文艺出版社

海峡文艺出版社
李璫◎等著



大学中庸 高级读解

华语世界权威国学读本
台湾国学教师必读手册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学中庸高级读解/李璠等著. —福州: 海峡文艺出版社, 2008.11

(纸生态书系·国学典藏/叶匡政主编).

ISBN 978-7-80719-346-3

I. 大… II. 李… III. ①儒家 ②大学—研究 ③中庸—研究 IV. B222.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75787 号

台湾正中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3—2008—020 号

大学中庸高级读解

作者: 李璠等

责任编辑: 郑咏枫

出版发行: 海峡文艺出版社

社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

邮编: 350001

发行部电话: 0591—87536724

印刷: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邮编: 065200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数: 100 千字

印张: 6

版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719-346-3

定价: 1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制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



纸生态书系·国学典藏

主 编：叶国政

总策划：黄永良

《大学中庸高级读解》著者：

台湾·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

主任委员：李 璠

编辑委员：陈新雄 张文彬 季旭升 潘丽珠 许俊雅

崔成宗 黄明理 王顺源 赖哲信

咨商委员：涂 琦 陈明玉

序

任继愈

这套“四书”读解，是台湾版《国学基本教材》的教师用书，引进内地出版，我想目的有两个：一是希望对语文老师的传统文化教学有帮助，二是为成人或学生自学儒家经典提供一个好的参考读本。

《论语》《孟子》是先秦的著作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成于汉初，这是学术界的共同看法。这四部书各自独立，不相联属。伊川程颐开创洛学，他经常以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为基本教材教育门徒。这四部书成为儒家系列丛书，应当说是从程颐开始的。但因为当时有些学派（如司马光）对这四部书不完全赞成，所以“四书”虽在北宋受重视，但未能定型。“四书”与“五经”并列，公开主张“四书”优于“五经”，并得到社会的认可，那是朱熹努力推行的结果。

韩愈、李翱对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予以阐发，但没有把它们从《礼记》中分离出来。朱熹说：河南程夫子也教人，必先使之用力乎《大学》《论语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。朱熹进而说明学习“四书”的顺序，学者应当“先读《大学》以定其规模，次读《论语》以立其根本，次读《孟子》以观其发越，次读《中庸》以求古人微妙处。”朱熹对“四书”的研究注释，投入了极大的工力。他对《大学》，加工较多，从中分出“经”及“传”并改变了原来的次序。对《中庸》，大体依照程颐的观点，重新分别章节，称为《大学章句》《中庸章句》。对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两书未曾改动，而是博览古今注释，择善而从，称为《集注》。《四书集注》吸收了唐宋以来的文化积累成果，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理论高度，建立了完整的儒教思想体系。“四书”是一部强化内心修养、涤除心灵杂念的儒教经典，所以也值得在今天的社会中传播。

王丽女士对传统文化在语文教育中的推广，一直非常热心。台湾版《国学基本教材》和这套“四书”读解也是她让我看的。我看了选材篇目，选看了其中解说注释，认为选材精当，注解简明，新人耳目。按照阅读的理解能力，安排选材先后顺序，符合指导教学和自学的要求。市场上见到的同类书籍中，这套读解的特色鲜明，优点突出。它不光是增加古汉语知识，对培养人的品格全面发展也有益。教育最终目的在于育人，育人先要育己，希望这套读解能对老师们教授传统文化有帮助，对年轻人自学儒家经典有参考价值。教育和学习，是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完成的。

台湾和大陆，血脉文化本属同根。在众多“四书”读本中增添一株奇葩也是一件好事，值得向社会推荐。

2008. 11. 26 北京

（任继愈，著名哲学家，1916年4月15日生。1964年，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，任所长。1987年后，任国家图书馆馆长，兼北京大学教授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导师，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。著有《中国哲学史论》等多种著作；主编有《中国哲学史》、《中国佛教史》、《中国道教史》《中国哲学发展史》等。）

目 录

1	任继愈·序
1	学庸概说
	大学选 19
	中庸选 53
74	附录一 朱熹大学章句全文
77	附录二 朱熹中庸章句全文
83	叶匡政·后记

学庸概说

大学

一、大学的单行

《大学》原是小戴《礼记》（西汉末戴圣所传）中的第四十二篇，自汉到唐，从未单行。北宋仁宗天圣八年，赐进士王拱辰《大学》篇一轴，自是以后，凡是考试及第的，必定赏赐《儒行》篇，或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，于是《大学》遂有单行本。而为《大学》单行本作注的，有喻樗的《大学解》、司马光的《大学广义》等，可是原书均已不传。到了南宋，为《大学》作注的，日益增多，只是这些书，如今多半都是有目无书。惟有朱熹采辑河南二程（程颢、程颐）夫子之说，附以己意，补其阙略，作《大学章句》，并与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合为《四书》，风行海内，流传于世。元仁宗以后的科举考试，明定采用，于是便成为显学了。

二、朱熹的版本

朱熹的《大学章句》与《礼记》的本子内容次序不同，是朱熹自己改订的。《礼记》的本子不分“经”和“传”，朱熹则分别为“经”一章，“传”十章，而且次序也有些更动。这种做法，虽然引起后儒的一些非议，然而其书能流传千古，为世人所接受，其价值也是不容抹煞的。王夫之《礼记章句》云：

《大学》一书，有郑氏《礼记》传本，其次序倒乱，朱子因程子所定而更为此篇。盖诸经之传，皆有错阙，而《礼记》为尤甚……是篇案圣经之文，以审为学之次第，令学者晓然于穷理尽性、守约施博之道，可谓至矣。愚谓十传之文，鳞次栉比，意得而理顺，即令古之为传者，参差互发，不必皆如此，而其命意，则实有然者。得朱子为之疏通而连贯之，作者之意，实有待以益明，是前此未然而昉于朱子，固无不可之有。况《礼

记》之流传舛误，郑氏亦屡有厘正而不仅此乎！

王夫之的意思是《礼记》传本颇多次序倒乱舛误，郑玄注解时已有改定，郑氏可以做，朱子未尝不可以做。而且朱子改定后，分“经”一章，“传”十章，“经”为全篇的纲领，是主旨所在；“传”是将“经”的主旨，逐条发挥申论。文字鳞次栉比，连系贯通，意得理顺，不仅不违背古人的意旨，反而使意旨更加明白而通晓。这就是何以朱子的《大学章句》一出，世人皆奉以为圭臬的主要原因。

三、大学的作者

《大学》一篇的作者，说者不一，程子以为是孔子的遗书，朱子则以《大学》的“经”，是孔子说的，曾子记述的；“传”是曾子的意思，曾子的门人所记的。朱子在《大学或问》中说：

正经辞约而礼备，言近而指远，非圣人不能及也。然而他无左验，且意其或出于古者先民之言也，故疑而不敢质。至于传文，或引曾子之言，而又多与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者合，则知其成于曾子门人之手，而子思以授孟子，无疑也。

朱子的说法，也是没有实证，所以引起后人的许多争议。如许谦的《四书丛说》以为是孔子所作，翟灏的《四书考异》以为是曾子之书，郑晓的《大学源流》以为是子思之作，近代学者又以为或出汉儒之手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今人陈槃《大学中庸今释》云：

《大学》这篇书，无论是谁做的，就说它是西汉的学者们所编述的也罢，然而它的材料，必然是早年传下来的，而且和孔子一派的儒者，也必然有深切的关系。一则，篇里头一再提到“子曰”，这种文例，就是孔子的学生们记述孔子说话最常用的文例（可看《论语》）；二则，“传”的六章引述曾子的话；最重要的三则，篇里头的思想，非常醇正，真正可以说是“祖述尧、舜，宪章文、武”。试想想，这种传统的、精深博大的儒家思想、儒家精神，如果不属于孔门，应该谁属？

陈氏从《大学》篇中的文例，以及引述曾子的话，再从文中思想考察，认定《大学》是出于孔门之作，此说应该比较中肯。

四、大学的要义

朱熹《大学章句》云：“《大学》之书，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。”“大学”本是学宫之名，乃天子所设立的最高学府；而《大学》一篇，则是大学里用来教学的课程。

《章句·序》又云：“人生八岁，则自王公以下，至于庶人之子弟，皆入小学，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，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之文。及其十有五年，则有天子之元子、众子，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，与凡民之秀俊，皆入大学，而教之以穷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之道。此又学校之教，大小之节，所以分也。”由此可知，“大学”是对“小学”而言。举凡年满十五岁，无论是天子的元子（嫡长子）、众子，或是公卿大夫的嫡子，以及人民秀俊杰出的子弟，都可以入学。所教的课程内容，正是《大学》所说的修己治人的学问。

“大学”作学宫名时，“大”字原音 tài，但是朱熹《大学章句·序》云：“大学者，大人之学也。”将“大学”解作“大人之学”，很显然地，朱熹认为“大学”之“大”，可以照本字读成 dà。清王夫之特别为之解释说：“大人者，成人也。十五而入大学，乃学为内圣外王之道，如字及音‘泰’者，义一而已。以《大学》为学宫名，非论学之道，故取于大人。”（《礼记章句》四二）王夫之认为“大学”作学宫名时，音“泰”，或照本字读，意义上并没有两样，都是指天子所设的最高学府，看不出有“论学之道”的意思。把“大学”解作“大人之学”，其取义与学宫不同；取义不同，音读自然也可以不一样，所以朱熹将“大学”之“大”，照本字来读。

《大学》之书，可说是孔子承继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德思想、学术系统而成的政治哲学。其中所述修己治人、明体达用之道，是由修养内在的德智，而至完成外发的事业，有其一贯进取开展的过程。《大学》一文，经朱熹重订，分为“经”一章、“传”十章，“经”是全文的总纲，“传”则分条细论，前四章统论纲领的旨趣，后六章细论条目的工夫。其精要即“经”所云的三纲领、八条目。所谓三纲领，就是明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；八条目，就是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简要说来，《大学》之书，就是教人达到内圣外王之道。

（一）三纲领释义

三纲领中的第一纲领是“明明德”。所谓“明明德”，就是明其明德，第一个“明”字是动词，第二个“明”字是形容词。朱熹《大学章句》云：“明，明之也。明德者，人之所得乎天，而虚灵不昧，以具众理而应万物者也。但为气禀所拘，人欲所蔽，则有时而昏，然其本体之明，则有未尝息者，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，以复其初也。”意思是说，人生下来，天就赋予一种灵明的德性，这种灵明的德性，就是“明德”。“明德”本来是人生所具有的，但是有时难免为气质所拘。人的气质有刚、有柔，有高明、有沉潜，如果任由其偏向发达，不加修省，一定会影响到本体，而为外在一切声色、货利、功名、权位等的物欲所蒙蔽，使之迷途忘返，渐渐失去其灵明的德性，而一切骄奢淫逸、失德败行的行为与恶习，便从之而生。因而大学之道第一纲领就是要修明“明德”，以去人欲而存天理，恢复初始所具有的“明德”。这是修己的工夫，也就是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”的纲领。

三个纲领中的第二纲领是“亲民”。朱熹从程子之说，以为“亲”当作“新”。《大学章句》云：“新者，革其旧之谓也。言既自明其明德，又当推以及人，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。”程子以为“亲民”当作“新民”是有其根据的，因为“传”第二章所说的，都是着重在“新”字，而且引《尚书·康诰》曰：“作新民。”朱熹的解释，“新”就是去除旧的。意思是说不仅自己能昭明其明德，还要能推己及人，使人人都能去其旧有的不良习染，都能昭明其明德。康诰说的“作新民”，正是鼓励人民要做新人，日新又新，进步不已。

不过，王阳明则依照“亲”字本义，解释“亲（新）民”为亲近民众。王阳明云：“明明德者，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。亲民者，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。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，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。是故亲吾之父，而后吾之心实与吾之父、人之父、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；实与之一体，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。亲吾之兄、人之兄、以及天下人之兄，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、人之兄、与天下人之兄为一体矣；实与之一体，而后弟之明德始明矣。君臣也，夫妇也，朋友也，以至于山川鬼神、鸟兽草木也，莫不有以亲之，以达吾一体之仁，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，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。”（《大学问》）王阳明以为“明明

德”、“亲民”是一贯的，不可分的；“明明德”是立体，“亲民”是达用；“明明德”的目的在于“亲民”，为了“亲民”所以要明其明德。好比亲爱自己的父、兄，再将这种亲爱的仁心，推及天下人的父、兄，使其成为一体。能够如此，然后孝、悌这种天赋的明德才能昭明。而君臣、夫妇、朋友，以至于万物，也无不切实地有以亲之，以达到视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心，而后自己的“明德”才无所不明。

其实程子释“亲民”为“新民”，王阳明释“亲民”为亲近民众，二者之间并无矛盾。

至于第三纲领“止于至善”，朱熹《大学章句》云：“止者，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。至善，则事理当然之极也。言明明德、新民，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，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，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。”朱熹的意思是说“止于至善”是就“明明德”与“新民”而言，二者皆必须达到于理无所不穷，于事无所不尽，毫无一丝私欲的至善至美的境地。

这一句话，亦可以有两种解释：一种是“精益求精，善更求善”的意思；一种是“择其至善，固执牢守”的意思。我们一个人明德、新民，皆应当向理想的至善之境，不断进取，必求达到至善至美之境，于理已无所不穷，于事已无所不尽，万物能各得其所，千古而不易其道，到这时候方得为止。把握住此至善之一点而固执不变，坚守不移，再不要驰骋妄想，见异思迁……推而至于我们做人也要如此，敦品励行，明德新民，必须做到尽善尽美，才算心安。尤必择善固守，明决果行，才能立身，才能立功！所以“止于至善”，又是统“明德”、“新民”两大目而言，为格、致、诚、正、修、齐、治、平八项条目的总纲。

由上而观，《大学》的三纲领，由“明明德”而“新民”而“止于至善”，乃是体系一贯，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，而非并列的三个纲领。其进行程序，本末终始，有条不紊。此三纲领是“体”，发而为“用”，则是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八项条目。格、致、诚、正、修五条目是修己，齐、治、平三条目是治人；修己治人，明体达用，群己内外，大小先后，逐层推展，极有条理，极有系统，是一部科学的儒家政治哲学。

（二）八条目释义

八条目就是讲从修己以至于治人所应有的先后步骤。《大学》云：“古

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”“明明德”就是“修身”。修身的目的在于平天下，要达到平天下的目的，就要使全天下人都要明明德。但是全天下的领域太大，全天下的人太多，无从着手，所以必须由近及远，由小及大，由一家一国做起。使自己一家人能够明明德，推而广之，使社会上每一家人都能明明德，再进而使一国，乃至全天下的人都能明明德，如此国哪有不治，天下哪有不太平的？所以修身是八条目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。这就是《大学》书中所以特别重视“修身”，而曰：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的道理。

1. 格物致知 修身的基本工夫，首在“格物、致知”。关于“格物、致知”的解释，朱熹与王阳明的说法不一。朱熹《大学章句》：“致，推极也。知，犹识也。推极吾之知识，欲其所知无不尽也。格，至也。物，犹事也。穷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极处无不到也。”朱熹认为“格物”就是“即物穷理”，对于客观事物要能随时随地体察明白，彻底认识事物的真理至最透辟的境地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要把一切事物的道理彻底研究清楚，使无任何疑惑才好。所谓“致知”，就是极力增进自己的知识，充实自己的知能，使达到知无不尽的地步。所以“格物”的目的在“致知”，要“致知”就必须“格物”。“格物致知”就是尽自己的知能，去彻底探究事物的道理，只要真积力久，一旦豁然贯通，则所有事物，不论表里精粗无不了解，而心中也就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明了。

朱熹其实是使用科学上的归纳法，由人伦日常行为的笃实处着手，由外而内，一点一滴，仔细用功，先弄清万事万物的道理，日积月累，然后理合为一，豁然贯通，终必了解人生真理。

王阳明认为朱熹的即物穷理，是以吾心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，务外遗内，博而寡要，必非其旨。所以释“格”为正，释“物”为事；“致知”为致吾心之良知。“致知格物”就是致吾心的良知于事事物物。王阳明说：“吾心之良知，即所谓天理也。致良知之于事事物物，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。致吾心之良知者，致知也。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，格物也。是合心与理为一者也。”（《传习录》）

王阳明不赞同朱熹的说法，是认为朱熹的“即物穷理”，是以心去求事物的理，将心与理分而为二，所以主张“致良知”。良知就是天理，致

良知于事事物物，就等于致天理于事事物物，所以事事物物皆得其理，也就是心与理合而为一。

朱、王二家说法虽然略有不同，但都不离即物穷理的工夫。

2. **诚意正心** “格物致知”是修身的最基本工夫，进一步就要做到“诚意、正心”。“格物致知”是从做学问、明事理着手；“诚意、正心”则是从意念、修为着手。《大学》云：“所谓诚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谦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”要诚意，首先要做到“毋自欺”。所谓“毋自欺”，就是屏绝侥幸心，排除苟且心，不宽恕自己，不欺蒙自己，不作有昧良心之举，不存敷衍姑息之念，一秉正觉，承认真理，勇猛精进，战胜一切。而“诚意”的功夫，又始于“慎独”。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，最容易产生恶念，甚至做出邪恶的行为，所以必须自我戒惕，要去人欲、存天理，以虚心诚意处理一切事物，而无愧于天地之间，这就是诚意的工夫。诚意是善恶的关头，为善为恶，为君子为禽兽，全在自己一念之间。但能辨别善恶，则是全靠自己有真知、有识力。倘若识力不足，必定见理不真，察事不明，善恶是非，浑然莫辨，那就无从诚意，也就无从正心了。所以“致知”又是“诚意”的前提。

心是一个人意念、行为之主，也是修身的根本工夫。朱熹《大学章句》：“意诚，则真无恶而实有善矣，所以能存是心以检其身。然或但知诚意，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，则又无以直内而修身也。”诚意固然可以使人意念中无恶而有善，但是否能时时存养省察，是很重要的关键。如果不能存养省察，也很难达到修身的目标。所以必须时时存养省察，使此心常常湛然虚明，不为物欲所蔽，不为感情所胜，所有的忿懣、恐惧、好乐、忧患，都能得其正；否则不免流为贪愚迷妄，甚或放僻邪侈，一切错误、罪恶，便由此而生。因此“正心”是继“诚意”之后，为修身的另一基本工夫。

3. **修身** 修身是自我的内在修养，包括学问与德行两方面，是修己、成己、立己的工夫，也是内圣的工夫。然后推而广之，由修己而及人，由成己而成物，由立己而立人，由内圣而外王，所以修身又是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枢纽。《大学》云：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可见修身的重要。

4. **齐家** “齐家”的“齐”，是“整齐”的“齐”的意思。每一个人的情感，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偏私，有偏私就不得其平。家中的人，如

果各有偏私，那家庭就无法相安。所以要“齐家”，使家里每一个人都能和睦相处，相亲相爱，首先就要去其偏私之心。其次，一家人之中，也有贤不肖、品德不齐的，如何使家里品德好的人，谦然而不自足，更求精进；使家里品德较差的人，觉悟自己的短处，而力求改过迁善，达到一家人都能明礼兴让，各得其所。那就必须自己修身，也要全家都修身。再推而扩之，使家家户户也都能达到这个境地。在伦常方面，父子有亲，长幼有序；在事物方面，有条理、有秩序，人尽其分，各竭其力。所以说“修身是齐家之本”。

5. 治国 能修身就能齐家，能齐家就能治国。孟子曰：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天下可运于掌。《诗》云：‘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’言举斯心，加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无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，无他焉，善推其所为而已矣。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》上）孟子这一段话，正是说明能齐家就能治国的道理。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，就是推己及人的恕道。在位者如果能将家中所行的伦常，推之于社会国家，使一国的人都能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；能将一家人的仁爱之心，推之于社会国家，使一国的人都能兴起仁爱之心；能将一家人礼让之心，推之于社会国家，使一国的人都能兴起礼让之心，如此，全国上下都能为善而不行恶，都能安分守己，行其所当行的路，做其所当做的事，这样的国家还会有不治的吗？

6. 平天下 至于平天下，《大学》也有一套政治主张：

（1）行絜矩之道 所谓絜矩，就是恕道。己立立人，与民同其好恶。人民喜欢的就给他，人民厌恶的就不要给他。同时还要以身作则，为民表率，使人民都知道孝顺父母，尊敬长者，对孤寡的人知所照顾，如此人民自然归心。

（2）行利民之道 在财经方面，首要不与民争利，不聚敛施夺，国不以利为利，要以义为利。使生产的多，食用的少。人民的财富足，府库的财用当然也就富足。这是以仁为本的财经法则。

（3）重用人之道 用人之道，首重仁人在位，因为只有仁人能爱人，能恶人。见到贤者就能优先举用，委以重任；见到恶人就能予以罢黜，远远隔离。《大学》云：“若有一个臣，断断兮无他技；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；人之彦圣，其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，寔

能容之，以能保我子孙黎民，尚亦有利哉！人之有技，媚嫉以恶之；人之彦圣，而违之俾不通，寔不能容，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，亦曰殆哉！”（《传》十章）假设一个臣子，即使没有什么长处，但是他为人笃实，心地美善，有容人的雅量，见到别人有好的才艺，有好的学识，有好的建言，就喜爱他，就像是自己所有，这种能爱才容人的臣子，虽然不及仁人，却也是可以容纳的，因为他还能“保我子孙黎民”，还是有利的。反之，如果只晓得嫉妒别人的才艺，排斥俊彦之士，这种臣子不能“保我子孙黎民”，无益有害，绝对不能用。凡是这些用人行政之道，都是平天下最重要的法则。

总之，《大学》一书，是教人由内在的德性修养，到外发的事业完成，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。已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，包罗无遗，而且发挥尽致，堪称得上是本末兼赅、惟精惟一、修己治人、明体达用的大学问。孙中山先生称扬《大学》的修、齐、治、平之教，是中国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，真是真知灼见。

中庸

一、中庸的单行

《中庸》原是小戴《礼记》的第三十一篇，在汉时已有单行本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于《礼记》一百三十一篇外，又有《中庸说》二篇可证。六朝时，宋戴颙作《礼记中庸传》二卷，梁武帝作《中庸讲疏》一卷，《私记制旨中庸义》五卷（不著撰人）；唐李翱作《中庸说》一卷；北宋胡瑗作《中庸义》一卷，陈襄《中庸讲义》一卷，乔执中作《中庸义》一卷，司马光作《中庸广义》一卷，宋仁宗时，并尝以《大学》、《儒行》或《中庸》赐考试及第的士子。至朱熹作《中庸章句》，与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合为四书，于是通行于世。

二、朱熹的中庸章句

朱熹的《中庸章句》，也是根据《礼记·中庸》篇加以编定，但原篇次序，并未改动，仅按照其内容性质，分为三十三章，每章加以简要的说明。使全篇脉络、系统，颇为清楚。《礼记·中庸》郑玄注，虽然有时也有分段，然而并没有分别说明，所以层次头绪不及朱熹的有条不紊。因而朱熹的本子对于读者来说，会有更多的启发与方便。

三、中庸的作者

《中庸》作者，向来认为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。如《孔丛子·居卫》篇所谓子思困于宋而作《中庸》。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也有“尝困于宋，子思作《中庸》”之说。程子曰：“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，子思恐其久而差也，故笔之于书，以授孟子。”朱熹亦云：“《中庸》何为而作也，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。”不过，也有人认为《中庸》里所引孔子之言，与《论语》不太一样，例如《论语·八佾》篇孔子说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”而《中庸》则说：“吾说夏礼，杞不足征也；吾学殷礼，有宋存焉。”彼此有很大差别，于是断定必非子思所作。这事清阎若璩《四书释地又读·有宋存条》已经予以驳正。阎氏以为“《中庸》既作于宋，易其文，殆为宋讳乎？”意思是说，《中庸》既然是子思客居宋国时所作，由于环境、礼貌等种种关系，说话当然应该谦逊些，这就是何以要改易孔子的话，其原因在此。

再如《中庸》第二十八章有“今天下，车同轨，书同文”。很像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的话，不该出现在春秋时代，因而怀疑《中庸》可能晚出，陈槃在《大学中庸今释》中，举隐公元年《左传》“天子七月而葬，同轨毕至”为例，说明“车同轨”这话，在孔子以前就有。至于“书同文”，他也认为华夏的文字都是从六书发展下来，春秋时尽管国别很多，然而朝聘天子，会盟诸侯，文书使节交互往来，不可能彼此之间的文字不通晓，这就是“同文”了。

《中庸》第二十六章“载华岳而不重”的“华岳”。也有人怀疑，因为《论》、《孟》都只举泰山，不举华岳。陈氏则据《释文》之说，“华岳”本来也作“山岳”，以为《中庸》原来本子究竟是作“华岳”抑或“山岳”，未可确知，不能据以为证。

《中庸》一开头就说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。”这很显然是性善之说，孟子从子思的门人受业，特别主张性善，然而在《孟子》书中却未见引述《中庸》这句话，因而有人怀疑《中庸》较《孟子》后出。其实《孟子》书颇有佚文，顾炎武《日知录》七、《孟子外篇》就举出好几条《孟子》书上未见之遗文。既有佚文，则其辩论性善时，是否引有《中庸》文字，则很难断定。即使未引，恐亦不能据以判定《中庸》必在《孟子》